

中国农户借贷的历史回顾、评价与启示

邹新阳^a, 王贵彬^b

(西南大学 a. 经济管理学院; b.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 中国农户借贷历史悠久,按照性质不同分为政府借贷、商业借贷和合作借贷三种。政府借贷又分为赈贷和生产放贷,但总体规模较小。商业借贷属于高利贷性质,历朝历代统治者均对利率及偿付方式有所限制。以合会和信用合作社为两种主要形式的合作借贷不仅有利于解决农户资金困难,还在活跃农村经济、改造农村社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对农户借贷性质的历史回顾和评价,得出对当前农村金融改革优化的四点启示:充分发展农村政策性金融,重点培植合作借贷形式,严控农地抵押贷款风险以及专门贫困设计贫困农户信贷制度。

关键词: 农户借贷; 政府借贷; 商业借贷; 合作借贷

中图分类号: F83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98(2017)05-0003-07

中国农户借贷历史源远流长,主要通过赈贷和信贷两条途径实现。赈贷是我国古时政府施行的一种救济制度,一般发生在灾荒年间,此时不仅农户的生产已无法维继,而且农户自身的生存也已经朝不保夕,故赈贷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相对而言,真正有意义的农户借贷为信贷,该类借贷又因为性质不同而分为政府生产放贷、商业借贷和合作借贷三种。由于政府生产借贷的量相对较少,本文将重点分析和评价后两种性质的借贷,以期对当前农村金融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一、农户借贷的历史回顾

(一) 政府借贷

1. 赈贷。政府借贷的主要形式是赈贷,是古时政府在灾荒过后,为满足倾家荡产的农户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维持生计的需要而施行的灾荒救济措施。赈贷最早可追溯到西周,《周礼》有“泉府…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1]西汉以后,赈贷应用逐步增加,唐宋有所发展,延续到明清时期。

2. 生产放贷。生产放贷是另一种形式的政府借贷,不同于赈贷的是,该类贷款不仅限于灾害期间,主要目的是对农户的生产救助,贷款对象为贫民,两汉诏书中多有体现。如西汉昭帝始元二年“遣者振贷贫民毋种食者”^①;西汉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贫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②;东汉章帝建初元年“方春东作,恐人稍受禀,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覆尤贫者,计贷并与之”^③;和帝永元六年“遣谒者分行禀贷三河、兖、冀、青州贫民”,永元十五年“禀贷颍川、汝南、陈留、江夏、梁国、敦煌贫民”,永元十六年“贫民有田业而以匱乏不能自农者,贷种粮”等^④。

① 《汉书》卷七《昭帝纪》

② 《汉书》卷九《元帝纪》

③ 《后汉书》卷三《肃宗孝帝纪》

④ 《后汉书》卷四《孝和孝殇帝纪》

收稿日期: 2017-03-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9CJY056);教育部专项中央高校重大项目(SWU1609114);重庆市教委教育规划项目(2012-GX-034);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12SKB018);西南大学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2016JY033)

作者简介: 邹新阳(1977-),女,黑龙江兰西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金融学和保险学的教学与研究。

(二) 商业借贷

1. 借贷形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西汉以后,非官方的商业借贷逐步发展起来,主要特征为高利贷性质。早期农户商业借贷主要采用信用形式,如果无法按期足额偿还,则选择以劳动产品或者劳动力本身冲抵。这一状态可以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唐代文物《武周长安三年(703年)曹保保举钱契》得到佐证^[2]:

长安三年二月廿七日,顺义乡曹保保并母目,于史玄政边举取铜钱叁佰贰拾文。月别依乡法生利入史,月满依数送利。如史须钱之日,利本即须具还。如延引不还,及无本利钱可还,将来年辰岁石宕渠口分常田贰亩,折充钱直。如身东西不在,一仰收后保人当代知。两和立契,画指为信。

钱主

举钱人曹保保、曹宝宝

母阿目十金

保人女师子

知见人杜孝忠

知见人吴申感

南北朝以后,担保贷款所占比例逐步增加,且以土地作为抵押品又占到担保贷款的一半以上。民国时,陕南和豫北地区土地抵押占到60%,山西的平顺、平定和介休更高,达80%^[3]。

2. 借贷发生比例。我国传统农户借贷的主要形式为商业借贷,特别是在近代信用合作发展之前。因早期没有完整的统计材料,本文使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央农业试验所的调研数据进行说明。1933年,全国22个省的统计显示,农户借贷比例非常高,多数省份在50%以上。由于该统计数据并未区分借贷性质,但由于合作社及其他性质资金在多数省份所占比例较低,故整体上依然可以佐证当时商业借贷发生比例(如表1所示)^[4]。按照发生借贷比例与资金性质比例相乘大致推算出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各省商业借贷发生比例依次为72.4%、42.0%、47.3%、48.0%、43.7%、60.1%、41.7%、42.9%、56.7%、49.7%、34.2%、40.1%、51.8%、39.9%、40.3%、46.8%、49.1%、61.8%、42.3%、52.1%、54.7%和49.4%,各省平均为49.7%。且当时的商业借贷遍及不同阶层的农业生产者,包括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和雇农等。

表1 1933年农户借贷发生与性质构成

单位: %

调研省	发生	性质			调研省	发生	性质		
		商业	合作	其他			商业	合作	其他
察哈尔	79	91.7	0	8.3	河南	41	83.3	0	16.7
绥远	48	87.5	0	12.5	湖北	46	87.1	3.7	9.2
宁夏	51	92.8	0	7.2	四川	56	92.5	0	7.5
青海	56	85.8	0	14.2	云南	46	86.8	1.9	11.3
甘肃	63	69.4	0	30.6	贵州	45	89.6	0	10.4
陕西	66	91.0	0.8	8.2	湖南	52	89.9	2.3	7.8
山西	61	93.6	0.4	6.0	江西	57	86.1	1.2	12.7
河北	51	81.7	10.5	7.8	浙江	67	92.3	1.5	6.2
山东	46	93.3	2.2	4.5	福建	55	94.7	0	5.3
江苏	62	91.4	2.5	6.1	广东	60	91.2	0.6	8.2
安徽	63	78.9	2.3	18.8	广西	51	96.9	0	3.1
平均	56	88.6	1.3	10.1					

注: 其他性质贷款包括: 会所、积谷仓、县立借贷所、教会和学校教员的贷款。

资料来源: 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农业经济科^[4]。

3. 借贷用途。我国古代农户借贷用途主要为消费借贷,仅有很少一部分为生产借贷。张东刚等(2009)的研究表明,1929到1933年,全国22省143个县的生产借贷为24%;1934到1935年,全国16省生产借贷为15.54%。在调研数据中,生产借贷比例最低的是1929年浙江崇德,仅为10.50%。在各类非生产性负债开支中,家庭生活必需开销所占比例最高,最大数据为1929年的浙江绍兴,达到63.75%^[5](见表2)。

表2 1929-1935年农户借贷用途分类

单位: %

时间	地区	生产	非生产			合计
			婚丧	生活必需	其他	
1929-1933年	全国22省143县	24.00				76.00
1934-1935年	全国16省	15.54	27.07	25.45	31.94	84.46
1929年	浙江崇德	10.50	37.50	40.00	12.00	89.50
	浙江兰溪	28.25	22.00	37.50	12.25	71.75
	浙江绍兴	12.50	21.25	63.75	2.50	87.50
1933-1934年	广西邕宁	28.20	25.10	43.10	3.50	71.70
	广西桂林	32.90	27.30	38.70	1.10	67.10
	广西龙州	11.50	40.10	48.20	0.20	88.50
1934年	云南开远	27.90	31.05	27.90	13.15	72.10

资料来源: 根据张东刚、关永强的数据整理^[5]。

4. 借贷来源。农户借贷主要来源于资金富余者,也有少部分来自银行。银行贷款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是银行迎合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的产物。1932年到1936年,金融机构的农户贷款逐年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在这5年内,银行对农户贷款从662.12增长到6844.13万元,增长10余倍。1936年,全国办理农业贷款的银行达到30余家,其中业务量的有10余家(如表3所示)。抗战期间,主要银行贷放的农业贷款进一步增加,以四大行^①为例,农业贷款比例从1938年的33%上升到1944年59%^[6]。

表3 1932-1936年部分金融机构农户贷款情况

单位: 万元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1936年
上海银行	20.00	102.26	421.40	608.00	480.00
江苏农民银行	589.80	340.85	880.00	1390.03	2167.75
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		53.40	158.96	417.19	1176.98
中国银行	0.38	64.61	309.50	600.00	808.10
浙江各县农民银行	14.15	58.42	78.87	140.00	600.00
杭州中国农工银行		26.74	33.87	—	—
金城银行	—	—	243.90	675.30	503.50
交通银行	—	—	8.00	100.00	400.00
浙江兴业银行	—	—	16.00	1.50	—
大陆银行	—	—	9.50	1.00	—
山东省银行	—	—	—	783.30	—
安徽省银行	—	—	—	—	156.80
山西省银行	—	—	—	—	55.00
云南银行	—	—	—	—	496.00
合计	655.26	646.28	2160.00	4716.32	6844.13

* 注: 1935年5月后,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更名为中国农民银行。

资料来源: 丁日初、沈祖炜^[6]。

(三) 合作借贷

历史上,农户合作借贷主要通过古老的合会完成。到清末民初,日本的“产业组合”思想和德国的合作精神先后传入中国,农户开始利用合作社融通资金。

1. 合会的类型及缺陷。合会是由会首邀集若干会脚组成的一种互助合作信用组织,从成立直至终止,会员人数、会期、会金数目不再变动。合会操作简单,第一期,各会脚交出会金若干融通给会首使用,以后每期会首及其他会脚继续交出会金,由一个未得会的会脚融入使用,如此循环,直到全体会脚都得到会而结束。按习惯,先得会的会员逐期付出的会金比以后得会的会员付出的会金多一些,含有还本付息和收本收息的意

①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

思,实际上是整借零还和零存整取的相互补充。我国资金融通类合会主要有四种类型,其差别在于各会脚得会的先后次序:

第一,单会:准确地讲是集资,不是典型的合会。起会是因会首急需资金,向其他乡邻、亲朋(会脚)借入资金,会金额度经常不相等,会脚随情谊厚薄融出多寡不定的资金,最后由会首按协商的次序归还。

第二,标会: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合会,标会是最为规范和科学的。标会是以出标的方式决定各会脚获得资金融通的早晚。各轮会金由会脚投标,记明每脚扣除利息的数额,利息扣除额最大者中标得会。

第三,摇会:各轮会金使用摇彩抓阄的方式决定。

第四,轮会:会金的先后顺序由各会脚事先决定,到期按排名顺序决定得会者。1943年,延安县姚店子一带三个庄子的合会调查数据显示,参会最多的庄子为白家崖,达到总户数的70%,最少的庙沟也达到33%(如表4所示)^[7]。

表4 延安县姚店区、川口区农户参与合会情况

被调查庄子	全庄户数	参会户数	参会户数百分比
姚店区三乡白家崖	40	28	70%
姚店区三乡童家沟	40	18	45%
川口区五乡庙沟	31	10	33%

资料来源: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7]。

合会作为合作融资方式,对农户融通资金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其内部合作的资金成本低于外部借贷,但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会金分配不公平。除了标会,可以按照会脚的意愿,通过“标”的高低,实现尽早或者较晚地获得资金融通。其他合会常出现有的轮次得到的会金多些,有的轮次少些。而取得哪一轮的会金则多靠碰运气、碰机会,不能合理分配。第二,难于管理。中国历史长曾经有过“百家争鸣”,但更长的时期内都是“儒家独尊”,法家的思想和地位从来没有超过儒家,有独尊儒术之嫌。这就使得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没有维护经济交易行为的《商法》,合会组织活动规则主要依据口头的“君子协定”,对合作人的素质要求是比较高的。另外合会也是忽聚忽散,政府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管理,容易出现不良分子诈骗奸取的事情,酿成地方上的信用风潮^[8]。

2. 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模式是中国近代学者在西方留学过程中习得,后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所重视,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对当时的农户借贷和农业生产起到非常积极的正面作用。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不同阶段作用所有差异。1923年,义赈救灾会借鉴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业务操作模式,组建香河县信用社,标志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开始。从1923年6月到1928年2月,合作社从零增加到569个,其中为“华洋义赈总会”承认的有129个,社员达13711户,自筹资金25780元。1928年2月,国民党中央第四次执监会上通过《组织合作运动委员会建设案》,开始在全国大范围内进行合作运动的宣传和指导。1934年2月17日公布《合作社法草案》,推行合作运动,同年4月,又在汉口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该行1935年5月更名为中国农民银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农业银行。该期间,农村合作运动有了长足发展,农村合作社数量和参加合作农户的数量均大大增加。从1933年到1936年,农村合作社从5335个增加到37318个,社员从184587人增加到1643670人。合作社形式多样,但信用合作社是最主要的部分,1933年为全部合作社的82.3%,1936年下降为55.3%,但仍居于首位^[9]。表5展示1933年19省市合作社发展状况,一年之内增加合作社9314家,其中,信用合作社增加5772家,占到全部信用社的61.4%^[10]。

除国统区外,陕甘宁边区也在同时期认真探索和发展合作社。边区农村在信用合作之前,与国统区相似,也存在“月月钱”、“挖崩子账”和“探买探卖”等高利贷形式。在革命区政府和银行的帮助下,延安农户先后组建多家信用合作社。1943年3月,成立延安南区沟门信用合作社,成为边区的第一家信用合作社。1944年,边区合作会议通过大力发展信用合作社议案,9月,信用合作社增加到20个,股金为4400万元,存款为1.12亿元,贷款为1.80亿元。年底,合作社又增加至86个,资金增加至5亿元。边区建立农村信用合作社,在扶持农户生产的同时,也有力地打击了当地的高利贷。如李家渠在1944年大量组建信用合作社后,“月月钱”利率由30%—50%下跌至20%—25%，“挖崩子账”利率由每集15%—20%下跌至5%—10%,而

南沟一带的“探买探卖”与“月月钱”则几乎绝迹^[11]。

表5 1933年19省市合作社发展概况

项目	年初		年内增加		年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合作社(家)	5335	100	9314	100	14649	100
信用合作社(家)	4119	77.2	5772	61.4	9841	67.2
合作社社员(人)	184587	100	372934	100	557521	100
信用合作社社员(人)	116259	63.0	187976	50.4	304235	54.6

注:年末信用合作社社员的原始数据为304226人,但根据年初数和年内增加数,以及年末人员比例推定该数据有误,订正为304235人。

资料来源: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农业经济科^[10]。

二、农户借贷历史的评价

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农户借贷的整体特征表现为总量不足,这与当前中国农户面临的问题具有相似性,也即在现代工业、商业的支撑下,中国农户借贷安排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所不同的是,今天的农户可以选择兼业经营,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制度中的路径依赖。传统农业社会,农户借贷安排包括政府借贷、商业借贷和合作借贷三种性质,由于政府借贷总量有限且不属于常态,主要借贷为商业借贷和合作借贷。在没有信用合作制度安排或者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农户无奈地选择带有高利贷性质的商业借贷。而当规范的合作借贷被引入后,农户还是理性地选择后者。可见,合作借贷是农户融资安排中的重要选择。这是我们从旧中国农户借贷行为及原有的制度安排中得到的总体感受。

(一) 政府借贷的评价

传统社会的政府信贷主要以赈贷为主,虽有一定比例的生产贷款,但总量有限。赈贷也不属于常态,主要发生在灾荒年间,但其积极意义值得肯定。赈贷的形式多样,有谷物、耕牛、农具也有货币,保障农民基本生计。赈贷贯穿于中国传统社会始终,从西周到清末,到两汉时期,赈贷已经有了规范的流程。一般放贷安排在春耕时节,主要目的在于辅助农户完成春耕和度过青黄不接的困难阶段。每一笔放贷都明确记录借款人、全家人口、实际劳动力人数、耕作土地面积、贷出种食数量、货币量,并签字画押。此后,各朝各代的政府借贷基本操作方式为发生太大的变化。

(二) 商业借贷的评价

商业借贷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主要借贷形式,农户商业借贷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其主要部分属于高利贷性质。正如陆深便在《燕闲录》中所言:“……放债之事……亦有不可废者,何则?富者贫之母,贫者一旦有缓急,必资于富,而富者以岁月取赢,要在有司者处之得其道耳。”由于高利贷性质的商业融资的存在,至少能够保证农户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

当然,高利贷,特别是土地抵押的高利贷,弊端非常明显,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采用刑律等手段进行控制。唐(701年)规定:负债出举,不得回利作本,并法外生利^①。宋(1016年)诏:民负息钱者,不得逼取其庄土、牛畜以偿^②。辽1057年和1083年两度禁止官员在部内放债^③。南宋1189年免除1187年以前的私债和1188年以后利息支付已经达到本金的债务^④。明代要求月利不得过3分,同时规定:豪势之人不得不经告官,强夺借债人的孳畜产业,准折借债人的妻妾子女^⑤。清(1166年)规定“收过一本一利后,余息追出充公”^⑥。总体而言,在各政府的管控下,封建社会的农户商业借贷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起到了一定的资金融通作用,但其对资金使用人的盘剥还是非常明显的^[13]。

① 《唐律疏议》卷二六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八大中祥符九年九月甲辰

③ 《辽史》卷二一《道宗纪一》,卷二四《道宗纪四》

④ 《宋史》卷三六《光宗纪》

⑤ 《明会典》卷一六四《钱债》

⑥ 《清高宗实录》卷七六一乾隆

(三) 农户合作借贷的评价

相对于商业借贷,合作借贷的优势则非常明显。民国时期,信用社从国家及私人银行获得资金来源后转贷给农户,利息远低于以高利贷为主的商业借贷。据当时对江浙、两广、两湖等 15 个省市 332 家信用社利率的调查显示:利率在 8 厘以下的有 29 家,8 厘-1 分的 75 家,1-1.2 分的 108 家,1.2-1.5 分以上的 50 家。信用合作社贷款利率平均低于高利贷 50% 左右^[13]。农户合作融资方式不仅有利于解决农户资金困难,同时在活跃农村经济、改造农村社会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管理下的合作借贷效果更好,很好地诠释了“民办”特征。虽然解放区地处边远,不属于传统富裕农业区,但使用自己的货币,作为独立的经济体,相对于国统区,其遭受通货膨胀的程度也要小得多,农户的生产剩余更多。当时解放区存在较多的可融通资金,包括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劳动收入剩余,各机关、部队、学校因生产自给运动后的闲置资金,以及部分老人的养老金和妇女的首饰等。1945 年,日本投降前,全边区信用合作社吸收存款约 15 亿元、3 万多块银元和若干首饰^[14]。

三、农户借贷创新的启示

从农户借贷的历史发展来看,三种性质的农户借贷各有特点,能够为今天的农村金融改革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政策参考。政府借贷虽然所占比例一直较低,但贯穿中国整个农业社会,表明其存在的必要性。商业借贷的积极作用,前文也有充分评价,特别需要关注历朝历代对土地抵押贷款的治理。合作借贷与农户的契合度相对较好,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古代农户选择不同性质的借贷形式满足生产和生活。各种借贷的功用及政府的管理措施能够指导今天的农村金融改革,主要启示如下:

(一) 充分发展农村政策性金融

在当前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背景下,农户作为借贷弱势群体,其借贷资金来源问题需要政府统筹安排,即需要农村政策性金融有所作为。政策性金融类似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政府借贷,虽然比例较低,但属于不可或缺的部分。农村政策性金融除了执行政府的农业政策以外,还要补充、纠正商业借贷、合作借贷在农业信贷领域的不足和偏差,并引导后两者增加农业的资金投入。我国农户借贷创新需要政策性资金的注入。具体改革思路有二,其一为间接服务农户借贷。农业政策性金融资金来源成本低,或者为财政资金,或者为低成本的信贷资金。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对农村商业金融机构和合作金融组织发放间接贷款,再通过后者扩大农业贷款范围和增加农户贷款量,以带动更多的资金投入农业。其二为直接为农户提供贷款。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我国唯一一家政策性银行机构,其主要贷款投放到农村流通领域的问题,长期未得到根本改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应进一步创新贷款业务,增加对农户生产的直接授信,以保障农户获得低成本的政府借贷。

(二) 重点培植合作借贷形式

合作借贷是“弱弱”的联合,无论是古已有之的合会,还是以信用合作为主的现代合作组织形式,都是非常有利于农户融资的。今天中国农户的诸多特征与新中国成立前的传统农户还是存在很多的相似性。无论是国统区,还是解放区,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及其融资效应来看,合作借贷是农户借贷的重要选择。合作借贷能够实现多类农户的信贷要求,包括普通农户和市场型农户。在农户借贷制度设计过程中,需要强调其民有民办的自下而上的特征。反观 20 世纪 30-40 年代,国统区与解放区合作社功能发挥的差异就与民办性质是否纯粹直接相关。国统区的信用合作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大部分合作社为权贵所操纵,变成部分成员的小金库。此类变性的信用社类似于漏斗,政府扶助农户的资金,大部分漏入权贵豪商的口袋,并未真正实现为普通农户提供资金的目的。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陕甘宁边区的信用合作社,采用农户自愿、互助和民主管理,政府仅在大的方向上给予指导,其功能与作用的发挥则更为充分。

(三) 严控农地抵押贷款风险

我国传统社会中,商业借贷发展到后期主要为土地抵押贷款,但由此带来的土地兼并和失地农民沦为流民后的社会问题,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前发展农村三权抵押,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后的贷款,一定要在充分保障农户基本权益的基础上,构建风险预警和防范体系。农村土地抵押贷款需要农村产权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和规范、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构建、农村担保体系完善

和农业保险业务的创新。上述制度安排可以保障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民的生存安全和生产安全隔离,农村土地物权的资产属性才能够真正实现。否则,农村土地抵押贷款可能产生的土地兼并和失地农民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可能酿成系统性风险。这也是我国农地金融制度构建一直以来存在支持和反对两种声音的根本原因。在当前的试点阶段,在农村土地承包权、经营权的确权完成之后,比较有意义的防范农村土地物权安全性的有效手段是大力发展农业保险,减少农户因无法偿还贷款而执行农地抵押。此外,农地使用权抵押贷款利率应实行政府补贴,抵押的时限需要严格控制,且必须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进行。

(四) 设计贫困农户信贷制度

贫困农户借贷,有时基于脱贫的目的,需求可能更为强烈,但该类农户借贷需要专门制度设计。这是因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借贷不适合,以互助为目的的合作借贷对于特别贫困的农户支持力度也不大。商业借贷和贫困农户具有天然的分隔性,理论上,商业借贷不会选择贫困农户,理性的贫困农户也不会选择高成本的商业借贷。合作借贷成员间通常资金实力差异较小,如果全部为贫困农户,也无法满足各成员的资金需求。贫困农户被排除在商业甚至合作借贷之外,并不表示贫困农户没有金融供给,可以通过小额信贷、联保贷款等途径获得部分信贷支持。针对该类农户借贷问题解决的关键手段是财政,而非金融,如财政基金扶助贫困农户组建的合作社就是非常有效的例证。该类合作社借用一般信用合作社的操作模式,要求成员中贫困农户要达到90%以上,主要合作资金为政府财政补贴。因此,贫困农户的借贷创新,必须通过政府财政援助或者带有财政性质的政策性金融注资提供启动资金,这起因于商业金融天然的嫌贫爱富和合作金融倾向成员相似的特征。

参考文献:

- [1]孙诒让(清).周礼正义(卷28)[M].北京:中华书局,1977:1098.
- [2]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叁[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214.
- [3]李三谋,方配贤.民国农村高利贷与土地兼并[J].农业考古,1998(3):164-169.
- [4]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农业经济科.各省农民借贷调查[J].农情报告,1934(2)4:30.
- [5]张东刚,关永强.1930年前后中国农家收支状况的实证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8(2):87-91.
- [6]丁日初,沈祖炜.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J].民国档案,1986(4):83-97.
- [7]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金融)[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626-627.
- [8]王贵彬.农村民间金融规范化运作的制度研究[R].重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研究报告,2006:26.
- [9]陈希敏.制度变迁中农户合作行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75.
- [10]实业部中央农业试验所农业经济科.全国合作事业调查[J].农情报告,1935(3)2:20-23.
- [1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金融)[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616.
- [12]邹新阳.农地金融制度构建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42.
- [13]傅宏.民国时期农村合作运动述评[J].徐州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4):81-85.
- [14]中国人民银行教材编审委员会.中国近代金融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322.

(下转第88页)

The Construction of Accounting Personnel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gher Accounting Education Supply Side Reform

RAO Xi , LUO Yun , HUANG Lijia

(School of Finance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22 ,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accounting talents are unbalanced. How can we a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of higher accounting education? What is the balanc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n accounting talent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to evaluate the accounting personnel ,and it is beneficial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accounting personn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Based on high accounting education supply side reform perspective ,by means of AHP method and fuzzy evaluation theory ,through questionnaires ,combined th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d the reasonable construction of accounting personnel quality assessment system ,obtained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provided a standard for quality assessment of accounting personnel.

Key words: accounting talents; supply side reform; quality evaluation; AHP and fuzzy theory

(责任编辑: 张秋虹)

(上接第 9 页)

Historical Review ,Assessment and Enlightenment on Rural Household 's Loan in China

ZOU Xinyang^a , WANG Guibing^b

(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China 's rural households have a long history; the main loaned methods include three kinds: governmental loans ,commercial loans and cooperative loans. Government loans are divided into rescue loan and productive lending ,but the general scale is limited. Commercial loans belong to usury ,so rulers of series of dynasties had restrictions on the interest rate and payment ways. Cooperative loans divided into two forms: 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s and Rural Credit Cooperatives. They not only help to solve the difficulty on financing of rural households ,but also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activating rural economy and reforming rural society. Through the historical review and evaluation of rural household loans ,four enlightenments could be seen for Current rural finance reform and optimization: adequately develop the rural policy finance ,focus on cultivating the form of cooperative lending ,strictly control the risks of rural land mortgage loans and specially designed the credit system for poor farmers.

Key words: rural household 's loan; governmental loan; commercial loan; cooperative loan

(责任编辑: 黎 芳)